

赓续中华文脉 绽放时代光彩

全省古籍工作座谈会专家发言摘登

编者按 古籍典藏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赓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5月29日,全省古籍工作座谈会在我市召开,古籍领域专家学者围绕高标准做好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出版、活化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本报今天摘登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典籍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

■ 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编兼主任,山东大学教授 杜泽逊



什么是古籍?按照我国现行规定,古籍是指1911年以前产生的印刷品,以及手抄本、手稿本,也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书写的文献资料。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古籍中,还包括1911年前周边国家使用汉字印刷或抄写的中国人的著作。

古籍形态当中第一类是非书籍类文献,这些文献经过系统整理后同样属于古籍范畴,包括甲骨文、金文、古陶文、简牍、帛书、石刻以及纸质文书等。纸质文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籍,而是文书,包括契约、档案、书信、书法作品等等。这些属于非书籍类的文献形态。

古书的分类,主要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四库全书》就分为经库、史库、子库、集库。后来又衍生出了丛书部和西学部。再就是宗教部分,包括佛教的《大藏经》、道教的《道藏》、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古籍也不少,这些属于宗教文献。

关于古籍的保存机构,旧时代有藏书楼,如天一阁、海源阁;新时代主要是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以及博物馆,如故宫博物院、山东省博物馆;还有寺庙、道观,北京的白云观就收藏了一部《道藏》。

历史上,古籍遭受过多次灾难。第一个灾难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第二个是西汉末年,农民战争导致皇宫藏书全部被烧光,有三万三千九百十卷之多。东汉末年,董卓迁都,皇宫的藏书基本上全覆没。西晋末年,首都被北方的刘曜、石勒攻克,皇家藏书毁于一旦。南朝梁时期,首都建康的藏书遭到了灭顶之灾,梁元帝在被敌军包围之后,把14万卷书放火烧掉了。隋朝末年,用大船沿着黄河往长安运书,不料大船倾覆。安史之乱,西安、洛阳全部沦陷,皇家藏书遭受空前浩劫。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很多书、书版、字画、工匠都被掳到北方。宋版书为什么都是南宋版的?就是因为北宋版被破坏殆尽。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从政治、民族的角度查禁图书3000多种。嘉庆二年,皇宫大火,400多种一级品全部烧毁。太平天国起义,镇江的《四库全书》、扬州的《四库全书》全部被毁,杭州的《四库全书》毁坏了四分之三。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其中那套《四库全书》被毁坏。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翰林院遭了灭顶之

灾,《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底本都在翰林院。现存于世的《永乐大典》数量稀少,原因就在于它被毁掉了,这是极其可惜的事情。再就是“一·二八”事变,日本人轰炸上海闸北,把商务印书馆全部炸毁。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图书馆,在当时是我国最大的图书馆,被全部炸毁。

所以,古人经常会慨叹,一本书能存还是不能存,完全看他的命,无可奈何。司马迁写《史记》,他说要“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让后人欣赏这本书。很幸运,《史记》传下来了。

白居易在去世前一年,在其文集的后记中说,他创作的大小诗篇一共3840首,集有5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给侄子,一本给外孙,“各藏于家,传于后”。

先哲们用生命写出来的典籍,记载了祖祖辈辈艰苦奋斗的历史、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人生的智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泉,民族文化的根脉,这些典籍不能再任其失传。不仅要保护好古籍,还要让典籍里的精神活起来,为创造新的更高的精神提供基础,提供营养。

我们要把古籍利用好,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要做好保护原件,二要让它的精神传下来。如果原件存得很好,内容却读不懂,历史文脉将无法延续?有些国家本来历史上用汉字,后来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结果怎么样?祖宗的书是用汉字写的,他们自己却看不懂了。我们还在用汉字,我们还在说汉语,为什么我们古书读不懂了,自己断了自己的根是不对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几本看家的书,我们儒家的《五经》就是看家的书。所以要保护、要传承,要阐释、要学习,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才是真正的传承。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第一点,深度的古籍整理工作人才队伍跟不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高亨先生注解的《周易》《老子》《诗经》《商君书》等,至今都是权威。新时期的权威从哪里来的?我们山东省新时期的高亨、王仲荦将如何产生呢?这个挑战是全国性的,不仅仅在我们山东。第二个挑战是古籍资源的使用,也就是数字化、公开化,山东还在起步阶段。目前,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山东省图书馆根据山东省委宣传部的安排,建起了山东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这个时代是数字化的时代,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是衡量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数字山东是我省的文化战略,古籍数字化我们要走在前列。现在山东省委宣传部大力推动古籍数字化公开化,山东省古籍数字平台就在这次会议上宣布公开,我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历史性一幕。

(记者 李泽亨整理)

新时代要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 中华书局原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原主任 徐俊



大力推动山东古籍整理出版的重大举措,必将对古籍传承保护起到重要作用。

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要充分认识到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时代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更加繁荣兴盛。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约1800种。不但数量超过过往,更在整理出版传世典籍之外,大力拓展整理出版范围,重点加强出土文献、域外汉籍、地方文献等特色文献的整理出版力度。特别是《永乐大典》、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正为打造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标志性成果而全力前进。

对当下和今后一段时期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我有三点认识。一是古籍整理出版要紧紧抓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血脉,源远流长而又与时俱进。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古籍文献,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发展,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让中华民族的基因与当代中国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现实文化相融通,这

样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葆有永恒的魅力,展现时代风采。第二,古籍整理出版要始终将追求还原古代典籍的准确面貌和精准阐释作为工作目标。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有完整系统的研究,对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进行系统整理,对各种文化形态和区域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梳理,这是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了解和理解、认识和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条件,也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意义所在。第三,古籍整理出版要始终将满足和引领广大人民群众的阅读需求作为工作要求。古代典籍是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研究对象,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与中国的传统人文学术共生共进,阅读古代典籍也是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必然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以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为载体,保存在书本中,更以人们日用而不觉的形式保存在民众生活中,需要我们去引领、去激发。

新时代要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关注青年一代的阅读需求和阅读习惯,创新阅读方式,让传统文化经典从古董架上走下来,融入我们的时代、融入学术、融入文化、融入生活。

(记者 马永伟整理)

让古籍里的知识看得懂记得住说得出口

■ 上海混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罗润洲



漫画系列,这个系列从2018年到现在,一共卖了4500万册,被我们的读者誉为“新时代的《十万个为什么》”。

我们还创作出版了《漫画百年党史》《半小时漫画党史》《一起来读毛泽东》《半小时漫画中共一大》等书,其中《漫画百年党史》的销量突破了150万册,在市场上取得了成功。

我们组建了两百人左右的团队,涉及非常多的知识领域,从历史、地理、文学、传记、文旅到航天、汽车工业、天文、医学、经济、金融、传统文化等。所有的领域都有一个痛点,就是这个领域内的有些知识“太专业,说不清”,说不清不是指专家和专家之间说不清,而是专业人员和普通的读者之间说不清。这就会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普通的读者根本不看,文学、传统文化、历史哲学等古典书籍当然也不例外,青少年群体尤其不喜欢看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让大家更感兴趣的普及读物,这非常难。我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首先回到人类学习的本质,在学习上人性有两个弱点,第一是不耐烦,第二是每个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去读一些简单快乐、不用动脑子的东西。

混知怎么讲知识?我们会把知识画成漫画,让读者瞬间就能看懂,而且忘不掉。比如,孔子有3000名徒弟,其中特别优秀的72位,我们做了“七十二贤”故事系列,七十二贤中又有十名学生经常会被孔子挂在嘴边,这样的逻辑关系我们要把它梳理清楚,这样让读者尤其是小读者读起来就会清晰很多。再比如在《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中要讲述明朝末年国土面积只有300万平方公里,清朝乾隆年间达到了1300万平方公里,把这些数字说出去读者没有感觉,但是画成上下两张图这么一对比,读者对大小就有概念了,这就是图像的力量。

我想分享的还有一点——兴趣化。如果说知识是一剂良药,药是苦口的,那兴趣化是什么?就是你给药包上一层糖衣,让它更好下咽。比如,历史中讲到元顺帝被明朝军队打败了,要回蒙古草原了,光这么讲很枯燥。我们就加一句——元顺帝说是因为当“北漂”生活压力太大,这样就会有趣很多。

知识分析也好,图像化也好,兴趣化也好,最终目的是要让读者看得懂、记得住、说得出口,这样才是一个成功的知识传播。

(记者 马永伟整理)

古籍里的文字如何活起来

■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总导演、总编剧 左兴



古籍传承,如何破题?我们为什么要策划《典籍里的中国》?记得有一次,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编务会议上,大家讨论精品选时,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提出了一个建议:能不能打造一个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栏目,比如《典籍里的中国》,当时大家认为是可行的。这是《典籍里的中国》的创意发端。

接到这项任务以后,我和整个团队花了一年的时间探讨怎么制作。中华典籍浩瀚如烟,到底从哪里入手?在何处破题?《史记》《大学》《中庸》《周易》《老子》《庄子》《天工开物》等等,这些都在我们最早要做的书目里,每一部都弥足珍贵,但是应该怎么做?一季节目只能做11期,到底应该做哪一部?截至目前,我们用了三年时间做了两季节目,其间得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历史研究院,以及全国各地各大研究机构、博物馆等部门单位数百位专家的大力支持。第一季做的典籍包括《尚书》《楚辞》《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史记》《道德经》《本草纲目》《周易》《论语》《传习录》《孙子兵法》,第

二季典籍名录上有《永乐大典》《汉书》《礼记》《诗经》《备急千金药方》《赵绝书》《芥子园画》《文心雕龙》《水经注》《说文解字》《茶经》。

我们围绕典籍的内容核心,找寻适合电视表达的突破口。“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资料搜寻中,我们发现典籍中相关先贤的故事精彩纷呈,从他们身上,我们坚定了创作这档栏目的决心。两季节目、22位先贤,有22个核心思想,比如老子的“上善若水”,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孙子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等等。

节目怎么做?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电视工作者要把节目做成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给更多人,让更多人听

得懂、爱看,在潜移默化当中理解典籍的精神。有些人读一辈子典籍也读不懂,但是通过节目能记住一个点,一个珍贵的点,也许这就是我们做典籍传承工作的意义。

我们通过模式“破”题,从一本书到一个人,再到一个大故事,最后是一个核心思想,也就是典籍的核心精神价值,通过以戏剧为主、专家阐释为辅,这一双线索能的方式,实现古今对话,而当代读书人撒贝宁是观众窥见历史的眼睛,做到了用细节还原场景、服化道皆参考典籍图片并邀请专家指导。“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们用心打磨节目,11个导演组前期筹备十有余月,每本书都整理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其中《尚书》查询了68本相关书籍和上千篇论文,编剧团队为《尚书》剧本前后修改了53个版本,《天工开物》剧本前后修改了37个

版本。匠心制作、屡获殊荣,节目播出后效果显而易见,《茶经》中王劲松的独白视频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量达2.3亿、点赞数超623万。

“《典籍里的中国》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传统典籍当代化传播的又一次有益尝试。”慎海雄在《求是》杂志刊文中指出。《典籍里的中国》实现了电视节目奖项的“大满贯”,分别获得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最佳电视综艺节目、第58届“亚广联”电视娱乐节目奖、2021年度广播电视创新创优节目等。

创新永不止步,《典籍里的中国》第三季即将播出,将实现更多典籍创新性转化,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记者 马永伟整理)